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语言的传承与变迁

——以丽江安乐二组为例

和紫琳[1]，和智利[2]

（1.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 云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丽江安乐二组是纳西、汉、藏等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典型村落，乡村振兴背景下安乐二组大力发展农家乐经济，成为丽江古城周边村落乡村振兴的典范。其农家乐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也给居民的语言生活带来显著变化。从乡村振兴视角入手，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安乐二组语言生活的表现、特点和形成机制做了深入分析。通过对安乐二组居民语言能力、语言选择、语言态度及村落语言景观等方面重点调查发现，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其语言传承和变迁体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母语传承存在性别和代际差异，母语传承在一段时期内曾被忽视，语言景观中民族语言文化资源意识较强；二是语言变迁呈现出“双言并存、普进方退”的特点，语言交际的代际差异逐渐显著，乡村经济发展给语言带来新活力。形成村落语言生活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农家乐经济发展促进了语言生活多元化发展；民族文化自豪是母语发展和传承的基石；学校教育既是兼用语能力提升也是母语传承的助推器；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兼用汉语的沃土。

关键词：乡村振兴；纳西族；语言景观；语言传承；语言变迁

中图分类号：H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25)02-0101-11

引 言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坚持乡村全面振兴，[①]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中国还有近4.77亿乡村人口，[②]可见乡村振兴仍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最艰巨和繁重的任务，乡村振兴是我国需要持续实施的一项国家战略。近年来乡村振兴也成为了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中语言与乡村振兴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自2021年以来，关于语言与乡村振兴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产出较多。部分语言学重要期刊还专门组织刊发了“语言与乡村振兴”“语言治理与共同富裕研究”等专题文章。现有成果一是聚焦于语言如何助力乡村振兴进行了理论探讨，如陈丽湘（2022），[③]

收稿日期：2024-10-22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滇川藏纳西语与周边语言深度接触融合的调查研究”（ZD202313）；云南师范大学2024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区域类型学视角下大理双河四音格研究”（M-A114）。

作者简介：和紫琳，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 [2018-02-04]. https://www.rmzxb.com.cn/c/2018-02-04/1952871.shtml. 2024-09-13.

② 中国统计年鉴2024[EB/OL]. [2025-03-31]. 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③ 陈丽湘. 语言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44-51.

赵婷婷（2022），[①] 银晴、田静、苏新春（2023），[②] 杨乐、李小云（2023）[③] 等；二是讨论了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果，如康慧琳（2022），[④] 朱胜晖、刘义兵、宁莎莎（2022），[⑤] 李蔚（2023）[⑥]，王艳、肖逸[⑦]等；三是通过开展实地调查描绘了乡村语言生活实景，分析现有语言生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如杨卉紫（2021），[⑧] 赵春燕（2022），[⑨] 邱春安、严修鸿（2022），[⑩] 郑亚豪（2022），[⑪] 刘志刚、杜敏（2022），[⑫] 王娟、党怀兴（2022），[⑬] 张蒙、杨菁、李少鹏（2023）[⑭]，黄昕瑶、和智利（2024）[⑮] 等。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指出：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同时针对不同类型村庄的振兴给予对应的指导性意见。[⑯] 我国乡村内部存在差异，根据这些差异可将一个个村庄分为不同类型。不同类型村庄应该有不同路径来实现振兴，语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应该有所不同。[⑰] 村落居民生活水平因旅游发展等不同形式的乡村振兴而受益，其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实际形态和模式各不相同，语言在其中的表现与存在的问题也应该得到关注。乡村振兴背景下语言传承与变迁的典型个案仍值得学界去挖掘和探讨。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丽江旅游业开始发展。在旅游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丽江古城周边的村落也开始发展农家乐经济。安乐二组的农家乐经济是丽江发展最早，且最具有规模的，是丽江古城周边村落成功发展农家乐经济的典型。现有研究成果中，无论是研究语言与乡村振兴，还是研究纳西族语言使用现状的，还都没有关于安乐二组语言与乡村振兴问题进行专题探讨的成果。因此本研究以安乐村二组为个案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语言的传承与变迁，以期丰富我国语言与乡村振兴的个案研究。

---

① 赵婷婷. 语言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青海省茶卡镇蒙古族的个案[J]. 民族教育研究，2022(04)：116-122.

② 银晴，田静，苏新春. 乡村振兴中的语言问题及解决路径[J]. 喀什大学学报，2023(04)：28-35.

③ 杨乐，李小云. 论民族地区的语言发展与乡村振兴：以云南省为例[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23(02)：55-65+184.

④ 康慧琳. 语言能力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J]. 社会发展研究，2020(04)：201-218+242.

⑤ 朱胜晖，刘义兵，宁莎莎.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J]. 民族教育研究，2022(06)：59-66.

⑥ 李蔚.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国民语言能力提升和国家通用语能力建设——基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语言调查[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03)：160-168.

⑦ 王艳，肖逸. 乡村振兴视域下特色民族村寨语言生态保护与开发——以鲁布革腊者村为例.[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3(04)：110-116.

⑧ 杨卉紫. 乡村振兴视域下南疆农村语言服务优化路径探析[J]. 喀什大学学报，2021(04)：100-106.

⑨ 赵春燕. 乡村振兴视域下理塘县中扎村的语言生活[J]. 语言战略研究，2022(01)：36-47.

⑩ 邱春安，严修鸿. 梅县农村客家话词汇使用现状调查研究[J]. 语言战略研究，2022(01)：61-74.

⑪ 郑亚豪. 豫东南耕地名称价值与规划研究[J]. 语言战略研究，2022(01)：75-83.

⑫ 刘志刚，杜敏.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及其建设——以甘肃省夏河县调查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143-154.

⑬ 王娟，党怀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林芝市 M 县的个案研究[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4)：93-98.

⑭ 张蒙，杨菁，李少鹏.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民族地区语言赋能政策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23(01)：137-143.

⑮ 黄昕瑶，和智利.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云南石菜江村语言生活调查[J]. 语言治理学刊，2024(01)：233-249.

⑯ 中共中央国务院.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EB/OL]. [2018-09-26].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2024-09-13.

⑰ 姚洋在“2021 年搜狐财经峰会”上所做的题为《经济新周期与消费新动力》的演讲[EB/OL]. [2024-07-12]. https://www.sohu.com/a/504488385_100001551.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安乐二组居民语言生活现状

安乐二组隶属于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黄山社区安乐村，位于丽江市古城区象山西路转盘西部，西邻青龙河，东邻东界河，北邻中济村，南与宏文村接壤。丽江城区从宏文村到尚义村的4个村在纳西语中称作［tʂhuɑ^{55}dy^{31}］，其中［tʂhuɑ^{55}］的纳西语义为“鹿”，［tʂhuɑ^{55}dy^{31}］义为“有鹿的地方”。听老人们说，这片土地上曾有过白鹿的踪迹，该地名也缘于此。从地理位置看，安乐村因位于4个村的最北面，纳西语中北为上，因而其纳西语名为［tʂhuɑ^{55}dy^{31}gə^{31}tshæ^{55}］，其中［gə^{31}tshæ^{55}］义为“上面的村子”。相比社区内其他村落安乐二组的经济发展较早，且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其是黄山社区居委会驻地，也是安乐村村委会驻地。安乐二组有86户居民共356人，是一个以纳西族为主，并有藏、白、汉等民族杂居的村落，多民族共居共融，农家乐经济发展较好的典型村寨。自2000年安乐二组开办第一家农家乐至今村内现有39家农家乐。安乐二组经济生活的发展变迁使得其语言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本文细致描述乡村振兴背景下安乐二组居民的语言生活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乡村振兴下语言传承与变迁特征，并探讨其成因。

语言生活是人们为了生存、交际和发展对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①。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语言生活中居民个人语言活动、村落语言景观、居民语言态度是最能够体现村落语言传承与变迁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语言生活现状部分重点考察了这三方面，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安乐二组居民的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是一种独特的人力资本，能够影响劳动者的收入。② 本文语言能力调查主要考察的是安乐二组居民汉语③、纳西语的使用能力及水平。

在调查中笔者将语言使用水平分为熟练、略懂、不懂3个等级。熟练即可以用纳西语进行日常表达交流；略懂指基本能听懂纳西语并做简单表达，或者只能听懂；不懂则是完全不会说也不会听纳西语。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6-19岁，20-39岁，40-59岁，60岁及以上。由于6岁以下儿童的语言能力不稳定，所以不列入调查范围内。④ 安乐二组居民纳西语使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见表1，汉语使用情况见表2。

表1　安乐二组居民纳西语使用情况

年龄段	总人数	熟练		略懂		不懂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6-19岁	9	8	88.89	1	11.11	0	0
20-39岁	14	9	64.29	4	28.57	1	7.14
40-59岁	18	16	88.89	0	0	2	11.11
60岁及以上	11	11	100	0	0	0	0
合计	52	44	84.62	5	9.62	3	5.77

表1显示：在52人中，不同年龄段熟练掌握纳西语的比例是84.62%，略懂的是9.62%，不

① 陈章太.关注中国语言生活[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4-9.

② 杨立权.中国少数民族世纪发展难题的语言战略抉择[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4(04):107-115.

③ 安乐村纳西族居民使用的汉语为普通话,其中包括普通话以及习得普通话过程中所使用的纳西普通话。

④ 语言使用水平及调查对象年龄划分参考戴庆厦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

懂的是 5.77%，说明安乐二组大多数居民能熟练掌握纳西语。20-39 岁不懂的有 1 人，40-59 岁不懂的有 2 人，这 3 个人都是从外面嫁进来的且目前还没学会也听不懂纳西语的汉族人，其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汉语的需求更高；纳西语是安乐二组居民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84.62%的居民纳西语掌握程度达到了熟练水平，其比例虽然不是在丽江城区周边村落中最高的，但可喜的是 6-19 岁的居民中还没有完全不懂纳西语的。

表 2　安乐二组居民汉语使用情况

年龄段	总人数	熟练		略懂		不懂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6-19 岁	9	9	100	0	0	0	0
20-39 岁	14	14	100	0	0	0	0
40-59 岁	18	11	61.11	7	38.89	0	0
60 岁及以上	11	3	27.27	8	72.73	0	0
合计	52	37	71.15	15	28.85	0	0

从表 2 可以看出，汉语水平“熟练”和“略懂”的共计 52 人，说明安乐二组的居民 100%都能使用汉语。其内部呈现出代际差异，40-59 岁汉语水平略懂的有 7 人，占比 38.89%，60 岁及以上汉语水平略懂的有 8 人，占比 72.73%，而 39 岁及以下汉语水平都为熟练。汉语使用情况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 39 岁及以下居民受教育比例和时间都高于其他年龄段，且其在正式语码选择时大多也会选用汉语。

（二）安乐二组居民不同语境的语言选择

安乐二组居民 90%以上是纳西族，还有少部分嫁入或者迁入的藏、白、汉等民族，大部分居民都会说纳西语和汉语。居民姓氏以和、李为主，同一家族内不通婚，其余均可通婚。村中一直有不同民族通婚的现象，但不多。居民的语言使用语境可分为非正式语境和正式语境。下面分别来看不同语境中安乐二组居民的语码选择情况。

1. 非正式语境。安乐二组居民普遍为纳西语-汉语双语者，具体语言选择依场合而异。居民在“同亲朋好友、村邻闲聊”及“在市场、小卖部”等这类非正式语境中倾向于选用纳西语。在家里，家庭成员间交流一般也都使用纳西语。然而，与晚辈交流时，汉语使用比例上升。

2000 年以后，安乐二组农家乐经济逐渐兴起，居民面对不同交际对象的语码选择有所不同。初期主要面向丽江本地人，因此纳西语使用频繁。2010 年左右，随着安乐二组农家乐发展，安乐二组成为丽江有名的农家乐特色村落，农家乐面向的客人不仅有丽江本地人，还有周边县区来丽江生活工作的“新丽江人”，甚至有游客慕名而来。居民们会根据客人的穿着相貌及口音来初步判断交际对象是否为纳西族人，再来确定具体使用汉语还是纳西语交流。村内居民间用母语交流，对农家乐顾客或租房者则先用汉语，确认对方为纳西族或懂纳西语后再转为纳西语。

2. 正式语境。据居民介绍，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及以前老师在除讲授课本内容使用汉语外，上课大部分情况都使用纳西语。因此 40-59 岁左右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其汉语水平仍然不高。居民在政府机关、医院或银行这类相对正式的语境中，都优先选择用纳西语。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村里多数小孩出生后最先接触及学习的是纳西语，一般到学校接受教育后才开始学习汉语。但由于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 90%以上都是纳西人，彼此之间交流多选择使用纳西语。

21 世纪初以后，为顺应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需求，居民开始在学前教子女汉语，正式场合中汉语使用频率增多。在诸如政府机关、医疗机构及银行等正式场合中，居民更倾向于用汉语交流。

对于居民而言，他们在日常劳作、工作与学习这类正式程度介于正式与非正式间的语境中，汉语的使用频率略高于纳西语。可见，2000 年以来居民的汉语普及程度及水平都明显提高。

（三）安乐二组居民的语言景观

语言景观可以反映出当地的语言生态环境，它可以发挥信息和象征两项功能，投射语言景观背后的身份认同和政策信息等，这些信息又可以通过官方标牌和非官方标牌得到体现。[①] 斯波斯基（Spolsky 2009）认为，考察语言景观是考察一个城市社会语言生态的好方法。如今的安乐二组，自村口深入村落内部，各类语言符号如店铺名称、广告宣传、标语横幅、招牌标识、公告展板以及信息橱窗等广泛分布，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语言环境。

语言景观中的官方标牌是自上而下的，官方常常借此传达国家的语言政策及官方意识形态，并潜移默化地管理公众的言语行为；非官方标牌是自下而上的，主要用于借此争取自身的实际利益或身份认同。[②] 在安乐二组乡村振兴进程中，其语言环境的构建同样体现了官方标牌和非官方标牌的职能划分。

1. 安乐二组官方标牌。安乐二组官方标牌主要包括了由各级政府机关、教育机构及居民委员会等官方实体所设立的标牌，其中最为显著的类别可分为宣传栏、建筑或地理标牌两类。

（1）宣传栏。这是一种包含字数最多的标牌类型，其结构通常有标题与主体内容两部分，常位于社区居委会、村委、学校门口等人流较多的位置，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黄山社区先进居民展示、党员及居民的行为准则、村落环境整治的红黑榜评选、环保与卫生知识的普及、学校各项活动的介绍、法治与国防教育的宣传，以及村内重要通知公示等。其主要宗旨在于传达国家方针政策，展现村落积极向上的形象，并确保村内政策的公开与透明性。这些标牌一般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有时也会出于特殊宣传需要出现一些繁体字、汉语拼音和英文等。

（2）建筑或地理标牌。这类标牌通常用于标注建筑、景点及行政机构名称，旨在明确功能、引导路线，如村口指示牌、四史教育馆等。设立者包括安乐二组自设机构（如村委、小区）及政府机构（如林业局站、居委会等），用字规范，均为简化汉字。此外，安乐二组官方标牌还包括横幅、道路指示牌、公告、管理人员信息公示板以及环境保护宣传展板等。例如在疫情期间，村内悬挂有诸如“携手抗疫，人人有责；避免聚集，减少走访”“提高警惕，减少外出；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宣传横幅。自 2020 年起，安乐二组进行了交通设施、住宅环境以及河道治理等一系列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今安乐二组创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项目正在进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官方标牌出现。

2. 安乐二组非官方标牌。安乐二组非官方标牌主要是由居民个体独立或集体创建的标牌，可分为农家乐标牌和超市标牌两类。

（1）农家乐标牌。安乐二组现有 39 家农家乐，村内语言景观最突出的就是农家乐标牌。其标牌各具特色，均由各家自主设计，多置于外墙或门头，普遍采用电脑打印字体，材质则以 PP 胶片、塑胶板、金属板材等为主。就内容而言，部分标识较为简洁，仅有名称及联络方式；多数标牌则更为详细，不仅列出了具体服务项目如“休闲、娱乐、宴会、化踪”等以及各家的特色菜肴等，同时附有预订电话，并对具体地址及方位进行了清晰指引，这是村内信息最为完备的农家乐标牌。近年来，农家乐在宣传方式上有了创新。除了传统标牌，农家乐大门上方还增添了精致的木质牌匾，部分牌匾除了汉字，还巧妙地融入了东巴文，丰富了文化内涵。店名叫法虽然千姿百态，但其构成大体相仿，一般由 3 个部分组成：一是表明所属和个性的区别性名号；二是从业类型名称；三是商业单位的通用称呼，我们分别称之为属名、业名和通名。这三名复合便成为店铺

① 尚国文，赵守辉. 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02)：214-223+320.

② 尚国文，赵守辉. 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02)：214-223+320.

的大名。[①] 安乐二组农家乐名称也多为“属名+业名”或“属名+通名”的组合。有的农家乐在属名后还结合了“农家乐”“食府”“休闲山庄”等业名，例如：“阿花农家乐”“雍金火塘食府”“鸿宇休闲山庄”等。有的是在属名后结合了“源”“居”“阁”等通名，例如：“纳喜源”“鑫鑫居”“雪莲阁”等。还有少数农家乐采用了“属名+通名+业名”的组合方式，例如：“好客居食府”“同禧园农家乐”“友来阁农家乐”等，主要表明经营者所从事的业务或所提供的服务类型。然而，真正能够彰显经营者个性并使之在同行中脱颖而出的，则是属名部分，例如上文中所提及的“阿花”“纳喜”等。安乐二组 39 个农家乐属名分类见表 3。

表 3　安乐二组农家乐标牌中的属名

类型	数量	属名
美好寓意	13	怡和祥、天天乐、友来、吉祥、华华神、纳喜、同禧、多喜、家家乐、好客、迎逸、百福、心想食诚
家庭成员名字	18	阿英、雪莲、鑫鑫、翠绿、华华神、秋香、多喜、福钰、阿花、向红、雍金、愉园、鸿宇、星云、红群、鑫辰、香茹、仙海
易记	9	天天乐、华华神、家家乐、玉米地、生产队、小豹子、隆齐对、杠赛花、心想食诚
谐音	5	华华神、隆齐对、杠赛花、鑫辰、心想食诚
其他寓意	10	玉米地、巷往、鑫鹿、生产队、小豹子、盐都菜、泽翁、土九碗、隆齐对、杠赛花

安乐二组农家乐属名类型可大概分为美好寓意、家庭成员名字、易记、谐音和其他寓意等 5 类。“多喜”有多喜乐的美好寓意，同时多喜也是这家农家乐男主人的名字；“天天乐”“家家乐”既有寓意美好又易记，为一对姐弟所开；“隆齐对”“杠赛花”这两个属名都是来源于麻将胡牌方式中的名称，既是谐音而且还易记；“华华神”是纳西语［$xua^{33}xua^{33}tshe^{31}$］的音译，有“幸福，顺意”之意，该属名有美好寓意，但音译选择用“华华”两字，而不是使用大多数纳西语音译会使用的“花花”，是因为这家农家乐的儿子名字里有一个“华”字；“心想食诚”，该属名来源于成语“心想事成”，把成语中的“事成”换成“食诚”，既有心想事成之意，也有用心做美食，诚信经营之意，同时还比较易记。有些属名的寓意，有的一眼便知，但有的并不好理解，例如：“玉米地”的得名是因为农家乐地址靠近早期安乐二组的一大片田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那里种植了玉米，在“玉米地农家乐”开办时那片田地依旧存在，在玉米地中开办起一个农家乐，故取名“玉米地”，该属名不仅赋予了农家乐特殊的含义，而且容易让人记住；多数农家乐以“XX 阁”作为名字，“阁”不仅有：楼房式的建筑物，中国传统建筑物；古代收藏图书、器物的建筑物[②]；宫殿等意义，也是纳西语［go^{31}］的音译，译为“XX 家”，比如“雪莲阁”可译为“雪莲家”或“雪莲的家”。安乐二组正积极实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在村内主干道设“农家乐一条街”等指引标牌，指示牌中出现了东巴文村名。根据收集到的语言景观材料分析，汉语在安乐二组语言环境占据主要地位，东巴文也有一席之地。

（2）超市标牌。安乐二组的非官方标牌除农家乐标牌外是超市标牌。由于安乐二组经济发展主要靠经营农家乐和出租自建房屋，村内人流量大，农家乐和居民对于超市商品需求大，村内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超市。超市标牌多使用塑料板和金属板。名称多为“属名+业名”的组合方式，例如安乐超市、阳光商行、丽胜源经营部等。

① 赵世举. 当代商业店名的构成类析及文化透视[J]. 云梦学刊,1999(01):78-80.

② 傅永和,李玲璞,向光忠. 汉字演变文化源流(下册)[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1027-1028.

安乐二组官方标牌设计精美，以竖式标牌及电脑生成的临时性标牌为主，内容规范，多用标准简化汉字。非官方标牌则兼具临时性与服务性特征，文字多样，含简化汉字、东巴文、繁体字，偶见英文及拼音。这表明私人标牌在内容与形式上拥有更高自主性与灵活性。整体上，汉字占主导。此语言景观展现本土文化特色，实现传承并创新词汇，体现文化自觉。在乡村振兴中，安乐二组的文化自觉驱动发展，保护传承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产业兴起，助力经济繁荣。

（四）安乐二组居民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人们对语言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语言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看法。[①] 虽然语言态度是一种比较主观的评价，但是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等有密切关系。本文针对安乐二组居民语言态度的研究，选用了直接询问和母语态度问卷表等考察了居民对纳西语、汉语的认同以及对子女语言学习的期望。

1. 对纳汉双语的认同情况。调研显示，安乐二组居民高度评价汉语与纳西语。纳西语被认为最“亲切悦耳”，在丽江“实用”且影响力大，居民对其情感深厚，视纳西语为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的关键。这一认同促进了纳西语的传承与发展，成为居民文化与精神依托，是乡村振兴的文化支撑。同时，居民对汉语评价也很高，这与经济现状及高包容度相关，期望通过自身汉语优势促进发展，有效弥补与丽江古城周边村落的经济差距。

安乐二组的纳西族人能够理性认识到本民族语言在实用性上的局限，并认同国家通用语言的功能优势。这一态度不仅促进了国家通用语在乡村的普及率和水平，对培育具备多语言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具有积极意义，进而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语言支持，推动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

2. 对子女语言学习的期望。语言期望体现群体或个人对语言规划、传承及未来发展的看法。安乐二组居民都希望自己和子女会讲纳西语、汉语两种语言，甚至部分居民想要子女学会说英语，认为英语对考试和以后的工作生活会有帮助。使用纳西语，并对纳西语保持尊重和认同，是维系村内和谐邻里关系的基础；使用汉语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在子女未来掌握纳西语的问题上，居民们倾向于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来传授纳西语。关于纳西语的表达能力，大多数居民期望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这反映了该语言社区中纳西族民众对纳西语的传承发展持有积极且热切的期望。乡村振兴中，传承母语、包容国家通用语等兼用语，培养双语及多语人才，是乡村振兴持续发展的人才保障。

二、安乐二组居民语言传承与变迁的特征

语言在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与产业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又会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生演变。因此本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安乐二组居民语言传承和语言变迁的特征进行分析。

（一）安乐二组村落语言传承的特征

1. 母语传承存在性别差异。（1）母语传承中母语使用水平存在性别差异。安乐二组受访青年纳西语水平存在差异。被调查者多数可以使用纳西语进行日常交流，但是不同性别青年居民使用纳西语水平存在差异。男性纳西语水平高于女性，男性青年多数都会使用纳西语，但有部分女性青年不会使用纳西语，对纳西语的掌握程度仅为可以用纳西语做简单表达，或者只是能听懂，不会用纳西语进行表达。（2）母语传承中母语使用场合存在性别差异。安乐二组受访青年在不同场合中语言使用存在着性别差异。他们在大多数场合说纳西语，但是不同性别居民纳西语的使用场合存在一定差异。多数场合使用纳西语交流的多为男性，交谈之中会出现纳西语和汉语自由转换的情况。同辈之间交流时优先选择使用汉语的多为女性，甚至男性青年与女性青年交流时也会适

① 戴庆厦. 社会语言学教程[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144.

时选择使用汉语。

原因主要是安乐二组青年中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较男性高，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比男性长。伴随经济发展，村子知名度的提升，长期待在村内的男性青年自信心提升，传承纳西语成为他们展现自信的一种方式。据笔者调查，安乐二组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几乎都为女性；且女性青年的工作场合比男性广，接触其他民族的人较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部分女性青年的父母有一方为其他民族的人。

2. 母语传承的重视程度存在一段时期的忽视。安乐二组居民受访的 52 人中，熟练掌握和略懂纳西语的有 49 人，有 3 人不懂纳西语，占比 5.77%，这 3 人是嫁进来且目前没有学会纳西语的汉族人。有 5 人略懂纳西语，占 9.62%，这 5 人中有的是父母一方为汉族人，有的是父母都是在单位工作的公职人员，父母在工作场合多使用汉语；有的是因为父母认为汉语的使用场合更多，因此没有刻意教授子女学习纳西语。可以看出，安乐二组居民在一段时期内对于传承纳西语不够重视。

但随着农家乐兴起，经济提升有效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所以在被访问的 6-19 岁人群中只有 1 人的纳西语水平为略懂，其余都为熟练。青少年语言状况是衡量民族地区语言功能变迁的重要指标，若忽视此问题，可能导致代际间传承断裂，危及纳西语存续。民族语言文字对文化、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承载乡愁、乡音，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关键。因此，保护与传承民族语言，开发语言文化，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3. 语言景观中的民族语言文化资源意识较强。安乐二组语言标牌以农家乐指示标牌和店铺标牌为主，指示标牌主要为来往者指明方向和位置，提供便利。另外，安乐二组内遍布房屋出租告示，彰显出其对多元人群的欢迎态度及住宿服务的开放性。这些多样化标牌丰富了安乐二组的标牌系统，旨在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并为访客带来便利。在安乐二组居民的语言景观构建中，标牌融入纳西特色与东巴文字，体现语言资源意识与地域特色。

安乐二组居民在语言景观构建上，不仅展现了村落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发展，还通过为词汇赋予新意进行了文化的创新与再创造，这些均是语言景观文化自觉性的显著表现。如多数农家乐以“XX 阁”作为名字，“阁”是纳西语［go^{31}］的音译，译为“XX 家”，说明了主人热情欢迎客人来到家里做客，在家里可以休闲娱乐，也可以参观欣赏建筑与陈设。乡村振兴中安乐二组居民的文化意识不仅为振兴进程增添强劲动力，还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推动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创意经济，拉动了安乐二组经济发展。虽然安乐二组是一个纳西族村落，但语言标牌都能正确使用汉字，说明安乐二组居民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持有积极态度。

（二）村落语言变迁的特征

1. 语言变迁呈现出“双言并存、普进方退”特点。纳西语为安乐二组居民的主要交际语言。该组纳西族为“纳西-汉”双语民族，在以前，中老年人掌握的汉语一般是介于纳西语和汉语方言之间的“纳西汉语方言”。随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推广，居民汉语水平提升，中老年人更多使用“纳西普通话”，年轻人则多使用标准普通话。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变迁主要体现在由少数民族语言转向汉语方言，再转向普通话，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周边纳西族村落也如此。但是在安乐二组居民很少有人会选择使用汉语丽江话交流，语言变迁体现为由纳西语直接转向普通话。中老年人几乎没有人会说汉语丽江话，大多数会说汉语丽江话的年轻人都是上学时与同学朋友、工作后与同事交流的过程中学会的，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家庭成员中有不会说纳西语的，才选择学习和使用汉语方言。到目前仍有一部分年轻人不会说汉语丽江话。安乐二组居民的语言变迁体现出“双言并存、普进方退”的语言特点。这是乡村振兴为安乐二组居民带来的语言变化。

2. 语言交际的代际差异逐渐显著。安乐二组居民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逐渐显著。在语言交际中，中老年人优先使用纳西语交流，且语句中夹杂的汉语词较少。年轻人的纳西语交际呈现出会说但不用的特点，如表示方位的词，［ȵi^{33}me^{33}thv^{33}］东边、［ȵi^{33}me^{33}gv^{31}］西边、［mɯ^{33}ly^{31}］南

边、[gə^{33}ly^{31}] 北边、[ʐi^{31}lɑ^{31}tɕ y^{31}] 右手边、[uæ^{33}lɑ^{31}tɕ y^{31}] 左手边等，多数年轻人会说且清楚地知道这些词的词义，但几乎不会在交际中使用，都是用汉借词替代。族际婚姻家庭内，母语传承存在弱化趋势。20-39 岁中存在部分只会听不会说纳西语的居民，其家庭几乎都是族际婚姻家庭。这是农家乐经济发展对安乐二组居民语言生活的影响。

从纳西语使用能力上来看，青少年的母语水平较低，而汉语水平又高于中老年人。居民语言文字使用能力越来越高，只有少数老年人对汉语及汉字掌握不熟练。经济发展推动生活水平提升及民族间交流融合，汉语因其广泛的适用性，成为继纳西语后与其他民族交流的主要语言。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在正式场合更倾向于选择普通话。

3. 经济发展给语言带来新的活力。农家乐经济兴起使乡村传统农事活动减少，市场行为渐增，显著影响了居民的言语表达，其中商业词汇大量涌入村落语言是最直观的体现。“八盘四碗”“十人一桌”“乳扇”“煎凉粉”“酥肉”等与农家乐经济有关的汉借词大量出现在日常交流中，成为高频词。近几年还出现了“假山”“鱼池”“火塘”“牌匾”等建设农家乐的汉借词。随着农家乐经济的形成，人际招呼语“下地去”逐渐被“回家上菜去”所取代。居民们出租自己家的自建房，“出租、承租、租金、租期”等成为必谈内容。农家乐经济既为村落语言注入新活力，也加速了传统语言元素的衰退及言语情境的消逝。居民下地干活的机会越来越少，“自留地、放水、堵水”等越来越陌生了。同笔者儿时记忆相比，村落传统言语场景发生了改变，以前居民在饭后会出来散步交流，在火把节时也会相聚在村口一起甩火把、打跳、唱歌。而今，这些场景也较少复现了。

三、安乐二组居民语言传承与变迁的原因

语言生态的重要特征是语言关系和谐①，语言生态建设需要维护语言的规范性、多样性和统一性②。乡村振兴战略下，语言生态建设的关键在于协调乡村语言环境与振兴发展的关系，进而促进语言在乡村经济文化繁荣中的积极作用，由此，安乐二组居民的语言生活呈多元和谐的状态。

（一）农家乐经济发展是语言生活多元化发展的动因

20 世纪 60—80 年代，安乐二组为丽江先进试点；20 世纪 90 年代末，安乐二组由传统“三农”村发展为农家乐村。农家乐最初主要承接纳西族社交活动“化赕”[xuɑ^{55} tsho^{31}]，“化赕”即群体共筹资金互助，是纳西族人热爱生活、助人为乐的积极反映。[xuɑ^{55} tsho^{31}] 为纳西语，[xuɑ^{55}] 即一群体，[tsho^{31}] 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所交赋税的称谓，纳西语借用 tsho^{31} 义“各人拿出东西合在一处”。[xuɑ^{55} tsho^{31}] 基于民间自愿原则，地缘性熟人及朋友等相互认识的人共同筹集等额资金，首先援助该群体中一位需要帮助的成员，这叫 [fæ^{55} tsho^{31}]，以解急难。同时，赕友借 [fæ^{55} tsho^{31}] 聚会之际共叙友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物质援助不再是赕友交往的首要目的，情感交流成为了核心内容。

最初化赕是在赕友家中聚会，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转为到农家乐化赕。再后来农家乐开始承接一些除化赕以外的宴请，如婚丧嫁娶等宴请。如今安乐二组农家乐不仅吸引丽江本地人还吸引了周边乡镇及来丽江工作旅居的“新丽江人”等。居民在服务纳西族以外的顾客时需使用汉语，因而中老年人的汉语水平也相应得到了提高。同时纳西语对汉语产生了影响，纳西语中一些特殊词汇，例如 [xuɑ^{55} tsho^{31}] 等进入到汉语丽江话词汇系统。

（二）民族文化自豪感是母语发展和传承的基石

在汉语逐渐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主流语言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应在掌握汉语的同时，不忽视本

① 张先亮，杨依希. 试论“语言生态”的属性特征[J]. 语言文字应用，2017(04)：122-131.

② 冯广艺.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语言资源问题[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6)：138-141.

族语言。纳西语作为纳西族的核心交际工具，是维系族群情感与身份认同的关键。安乐二组居民坚定传承纳西语，同时对族际交流持开放态度，积极学习汉语及文化。多数居民认为，学习纳西语及其文化能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荣誉感。在安乐二组，纳西语是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虽有少量现代汉语词汇融入，偶尔有“夹汉”现象，但纳西语的整体保存状况良好。许多中老年人深感自豪，认为作为纳西族，传承纳西语是责任所在。在家庭教育中，多数长辈会主动传授纳西语，部分则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确保下一代学习纳西语。居民重视内部传承与外部传播，面对外族人学习纳西语的热情，受访者均期望广泛传播纳西文化。

（三）学校教育既是兼用语能力提升也是母语传承的助推器

自 2000 年以来，居民受教育水平呈现稳步增长趋势。至 2024 年 2 月止，已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人数累积约 55 人，其中男性占比较小，仅有 12 人，而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安乐二组的 39 岁及以下的青年女性几乎全部接受了高等教育，她们不仅学习时间长，而且多数选择前往外地深造，她们在外地生活的时间较长，与更多民族接触，从而汉语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居民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不仅体现在青少年上，有的中老年人甚至上了成人大学、老年大学，其普通话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著名纳西学专家郭大烈先生、黄琳娜女士等呼吁传承东巴文化，第一个小学东巴文化传承班于 1999 年 4 月 10 日在黄山完小顺利开班，因此当时在黄山完小上学的居民的民族文化素养及纳西语水平较其他人高。

（四）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兼用语发展的关键因素

据村中老人讲述：1936 年红军长征途经安乐二组，播下革命火种。20 世纪 30 年代末，李元勋于安乐村创办乐群学校及培德补习班，其子李刚与郭耀南、和国伟等人以此为基地传播进步思想并开设识字班。培德补习班为居民汉语学习奠定了基础。

1954 至 1982 年，黄山作为中共丽江地委重点区域，常有工作队驻扎。1954 年春，黄山 13 户农民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丽江首批之一。1964 年黄山大丰收，次年被评为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事迹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安乐二组居民思想开放，积极学习党中央的政策，汉语水平显著提升。

结　语

语言如何服务于乡村振兴？语言可以扶贫，认识语言的扶贫功能，可以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修筑起脱贫的语言大道，以此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①] 厘清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语言生活的现状及变化，是充分发挥语言功能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下，构建和谐的民汉双语环境，有助于深化民族间交流认同，实现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推动民族语言产业发展，构建语言文化产业链，能有效挖掘语言的经济潜能。同时，保护并传承民族语言，维持其生命力，对于持久展现民族语言的社会文化价值至关重要。语言作为文化的基石，是民族身份与价值认同的核心要素。保持民族语言活力，方能维系民族地区文化根基。唯有稳固这一“根基”，方能树立文化自信，进而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汉语是不同民族交流的桥梁，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能够扩大民族文化产品的辐射范围，我们应充分发挥其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言根基的作用。

① 李宇明. 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序《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C]//语言生活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2018:5-7.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of Village Langu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Lijiang Anle Group 2 as an example

HE Zilin[1], HE Zhili[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2.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Anle Group 2 is a typical multi-ethnic mixed and symbiotic village of Naxi, Han, Tibet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le Group 2 has vigorously developed the agritainment economy, created a beautiful picture of multi-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thriving life, and become a model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villages and villages around the ancient city of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its rural tourism economy has not only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lifestyle of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brought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ir language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aper uses questionnaire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lif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 Anle group. A focus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choice, language attitude, and village language landscape of residents in Anle Group 2, found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ir language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reflect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there are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mother tongue inheritance, the inheritance of mother tongue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there is a strong awareness of ethnic language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language landscape. Secondly, language changes exhib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existence of two languages and universal advancement leading to regress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re gradually becoming significa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brings new linguistic vitality.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existing language life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life; national cultural pride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he mother tongue; schoo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means of improving language proficiency, but also a booster for mother tongue inheritance; and that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is a key factor in using Chinese as a language.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Naxi minority; language landscape; language inheritance; change of language

[责任编辑:崔　萍]